

读者参考

失守的黑夜

◎最重要的是让民众创富

◎楼市反弹真相 ◎中国经济未触底请勿盲目乐观

◎格莱美为什么这么美?

◎上山下乡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 ◎中国式“外脑”

DU
ZHE
CAN
KAO
CONG
SHU

学林出版社



读者参考

丛书
8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守的黑夜 /《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编. —上
海:学林出版社,2009. 8
(读者参考丛书:88/林雨主编)
ISBN 978 - 7 - 80730 - 856 - 0

I. 失… II. 读… III. 文摘—中国 IV. 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3486 号

本书资料除编者据各种资料汇编而成的文字以外, 所用图文资料
均标明出处及作者。转录图文均酌付稿酬。有未及奉达者, 请即与我
编辑部联系。

失守的黑夜

读者参考丛书(88)

2009 年 8 月出版

编辑:《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 雨

责任编辑:天 水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邮政编码:200235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文庙路 120 号

邮政编码:200010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8

字数:28 万

ISBN 978 - 7 - 80730 - 856 - 0/Z · 33

定价:13.00 元

读者参考丛书	惯性“维稳”破局	1
(88)	财政如何透明？	
	——一名政协委员的疑问	6
失守的黑夜	让利于民与经济振兴	10
目录	中国对外投资要避免四大误区	13
	世界经济复苏取决于中美合作	17
	中国如何规避中美经济再平衡	
	的痛苦	19
	朝鲜火箭背后的“边缘游戏”	23
	可口可乐收购案被否决透露怎样	
	的信号	27
	中国需全民普及海岛知识	29
	中国经济未触底请勿盲目乐观	31
	上海展望“人民币本位”	33
	为什么民众不以偷税为耻	37
	最重要的是让民众创富	59
	花钱的心理	42
	你必须了解的理财数字	127
	散户亏钱十五大恶习	46
	楼市反弹真相	49
	中国婚姻五大态势	53
	新生活模式	
	——不完全单身	55
	中国新“外脑”	58
	一个医生的救赎	60
	普通人为何怀念胡耀邦	64

争议狂人茅于轼	66
荣智健:红色贵族黯然谢幕	68
记住蒋经国	71
你要爱你的寂寞	73
长大有迹可循	16
拒绝是一种能力	75
医改艰难转身	78
一个民间医改者和他的 30 万会员	83
一个过度医疗的典型样本	86
谁在统治网民	89
80 后素描	91
“鸟巢一代”的艰难转型	95
蜗牛壳里的御宅族	98
大学生为什么找不到工作	101
金融危机下的创业项目	105
中国式教育:正在把最好的天性慢慢 磨灭	106
培养精英还是误人子弟 ——对话义乌工商学院副院长贾少华	107
格莱美为什么这么美	110
美女巴赫	112
如何进入瓦格纳的音乐世界	41
“我想拍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 ——专访电影《南京! 南京!》导演陆川	114
重构是对历史的深入了解	126

毕飞宇:我是一个疼痛的人	128
“我们这代作家,就是个温饱”	134
阅读的要素	138
缘智攀知人	140
“中国式”新闻出版改革初定	143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	145
中国士大夫的沉沦	
——“陈伯达现象”的再思考	149
上山下乡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	
——专访《中国知青史——大潮》作者刘小萌	152
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	28
他山之石	158
解读“发展”的一个新视角	
——读《以自由看待发展》随想	160
失守的黑夜	163
外大陆架:“蓝色圈地”的最后空间	167
潜伏待发的十大自然灾害	172
贪官如何不再轻判	174
还有多少王帅因言获罪	36
公民身份证信息泄露严重	18
十大未解的科学之谜	178
电脑与人脑	180

中国养多少兵才够	183
现代雇佣军运作模式揭秘	186
 中国土壤治污形势严峻	
污染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	191
长江上游水电开发秩序待治	45
沪昆高铁过湘之争	196
 香港的知识分子关注什么	
日常以及日常之上的台湾	198
日常以及日常之上的台湾	200
 芮成钢：我们该如何看待世界	
中国人的热情让我受不了	204
中国人的热情让我受不了	206
 财产申报在国外	
日法美文化传播秘诀	177
解读外国人肢体语言	208
索马里海盗背后的犯罪集团	212
世界现存九大最古老天文台	216
德国人能站就不坐	218
德国人能站就不坐	197
 世行报告：中国贫困线与国际标准	
差距悬殊	137
是政府分少了还是百姓分少了	74
6000 万吨国储粮成烫手山芋	220
离谱的景点门票还要扛多久	133
官员“跨国家庭”的暗箱	139
削减公车比限行更能缓解拥堵	9
公共投资应向哪里倾斜	214
养老金还能涨多高	203
百姓怎么找到和两会的连通渠道	162
公立医院 90% 资金来自患者	171

当甲型 H1N1 流感来临	221
流感病毒的进化传播图谱	223
提高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	227
感冒药为什么不能随便吃	228
治疗感冒的多种误区	230
中年人该吃的九种排毒食品	233
减缓骨质疏松的进程	235
过多光照有害前列腺	88
十一种食物可防男性猝死	238
小改变让你更健康	205
为什么会失眠	190
早餐的错误	159
患者生存期预测：最不人道的“科学”	215
中医这样治疗感冒	247
让血液变得干净	249
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	240
谈口味	245
可乐悖论	243
今日说法	5、12、22、30、32、48、 52、57、63、70、72、77、82、94、 97、104、109、111、142、144、148、 151、157、166、179、182、185、195、 199、207、211、222、226、229、232、 234、239、244、248、249

封面图片 小白杨，新墨西哥州

摄影 [美]安塞尔·亚当斯

选自林路著《摄影艺术二十讲》，学林出版社

惯性“维稳”破局

□杨军

无论政治怎样变化，很多社会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常态社会的一个标志。衡量一种制度、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并不是有没有冲突。社会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有效协调和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这种思维是很多官员欠缺的。

早在本世纪初，前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曾做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有：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八九年过去了，回头看这五大因素，是得到了根本改善，还是有的问题甚至更加恶化？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产生大量不稳定因素的过程。旧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日益增加。近年来，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社会冲突激化，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明显增多，群体事件中更出现多起无直接冲突事件。从农村失地农民、城市拆迁户的抗议，到各地出租车司机的罢运，再到教师罢课、工人停工，社会冲突在强度和广度上大有扩散的趋势。2008年社会冲突事件数量明显上升，2009年，这一势头似未得到有效遏制。

经济危机更为现实百上加斤。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在情况发生改善一段时间之后出现突然的经

济倒退，会引起人们最大的不满，因为人们的预期提高而实际经济却已衰退，心理落差巨大。经过了多年令世界瞩目的经济高增长的中国社会，在经济危机面前，将因经济停滞甚至倒退而面临更大的政治社会风险。一些海外媒体甚至认为中国2009年将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一些敏感的时间点被认为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中国的执政者也把2009年视为社会稳定 的敏感时期。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认为：2009年将是各类社会矛盾碰头叠加的一年。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经过30年的改革之后，已经进入社会冲突多发期，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稳定一直是中国政治的重中之重，执政者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在如此严峻的内外环境面前，保稳定成为今年的主旋律皆在意料之中。但是，随着社会冲突的多发和各部门维稳力度的加强，随

之而来的问题是：该如何看待现在的社会冲突？加强控制力是不是必然能减少冲突？什么是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

学界的共识是，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而在一个日益开放的国家，想得到真正的稳定，依靠计划经济时期的手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维稳，必须要有新思维。

从强力控制和动态平衡

国庆、奥运会、“两会”等所有重大日程期间，地方官员都高度紧张，因为一旦自己管辖的地区出现进京上访人员，他们头上的乌纱便有可能不保。地方政府门前出现示威静坐，也是政绩考核的一个污点。群体冲突、停工、罢运等事件都会让地方官员胆颤心惊，因为稳定是最大的政治，而这些都被认为是不稳定的表现。努力把这些所谓的不稳定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是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工作。长久以来，中国在稳定问题上都存在着泛化和扩大化趋势，有着顽固的“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

改革开放 30 年之后，众所周知，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在体制变革、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处于非均衡状态，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它们通过博弈进行利益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群体性事件，并不是政治事件或者刑事案件，往往只是利益表达和博弈的形式之

一，是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的无奈之举。并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不会从根本上对政府统治造成冲击。并非所有的社会冲突都具有政治性，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真正的政治性冲突少之又少。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虽然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频发，但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稳定，是一种全局意义上的概念，更多的是指基本的秩序和制度框架意义上的稳定，而不应将社会生活中任何矛盾都视之为稳定问题。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本来只是一个正当的利益的表达，政府反应却过大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社会矛盾和冲突将会是未来社会的家常便饭，是常规化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无论政治怎样变化，很多社会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常态社会的一个标志。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利益冲突是社会常规化组成部分。衡量一种制度、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并不是有没有冲突，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是不存在的，社会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有效协调和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这种思维是很多官员欠缺的。

不久前故去的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政府形式，甚至也不在于政治参与的程度，而在于是否达到了足够的制度化水平，建立了有效的社会控制。而在中国社会，社会控制也很有效，但这

种有效主要来自人治，而不是靠制度。这反而容易导致公平的丧失和不稳定性。

在政治学者看来，政治稳定可以划分为强力控制型和动态平衡型两种形态。强力控制型下的稳定可能会比动态平衡型稳定少发生社会冲突，但是，任何强力控制型的稳定都有其边界和临界点，一旦越过，社会将陷入动荡。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是靠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强力控制来保持稳定。而当中国日益开放和民主化，政治稳定也必将过渡到动态平衡型。相应地，执政者的稳定思维也应随之转变。在社会冲突敏感期，不仅需要执政智慧，更需要和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新的稳定思维。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无论何种政治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经历过不同阶段的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的社会冲突和游行示威等活动非常多。如果政治体系具有高度的消化能力，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往往变成政治进步的动力。政治体系没有消化能力，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才可能导致政治社会不稳定。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甚至认为，社会冲突可以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即起到发泄释放的通道的作用。

社会冲突也并不一定会影响经济发展，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

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利益冲突是最理性的

如果说当今中国社会的大部分社会冲突是利益冲突，那么，大量的利益冲突的存在，以至有的发展成群体事件，会不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威胁呢？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欧美大量的社会运动兴起。在此之前，社会冲突被看作是经济变化和工业化的产物，会随教育的发展和一个有产的中间阶层的成长而逐渐消失。但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却活跃着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这些运动更多地源自人民不断升高的期望，人们所想要的东西与他们实际预期获得的东西之间存在差异，这是冲突产生的根源。欲望和预期之间的鸿沟被称为“相对剥夺”。

在中国经济腾飞的 30 年间，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而众多的弱势群体却在第二轮改革中成为改革的牺牲者。也许，从绝对数值上看，这些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虽然速度缓慢，但是因为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一群体并不会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觉得幸福和满足，而是会在赢家通吃的对比下产生“相对剥夺感”。

在这么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出现民工荒之前，农民工的工资十几年没有增加。纺织行业等一些传统行业的工人的待遇也十多年基本没变。一些传统制药行业工人工资甚至出现了下滑。在企业内部，工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一些国企老总年薪以千万元计。而社会再分配并没有弥补这一差距。医保本来是为广大民众提供福利的，而在一些地方，医保部门越来越成为权力新贵，千方百计克扣百姓福利，一些人的应报款项无法报销，而医保资金却大量节余。早在 2004 年，国家的公共政策就开始转向，但因为长期形成的利益集团和社会权力格局等阻碍或惯性，所有为缩小社会差距的努力最终并没有在民众身上得到完全的体现。

可以说，在第二轮改革的博弈中，弱势群体丧失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但是，只要没有超过他们的耐受极限，便不会爆发大规模群体事件。近年，工人停工等事件也曾出现过，但只要资方做小小的让步，把他们低得可怜的工资提高合理的幅度，他们便很快复工了。而包括广受关注的瓮安事件在内的大部分群体性事件，如果观察其发展脉络，便可发现如果事件能够早点得到解决，根本不会发展到暴力冲突的程度。

有人这样形容现阶段的社会冲突：中国的社会冲突经历了由知识精英主导的进取性争权，到由工农为主体的反应性维权抗争活动的转

变。前者的特点是在民主和法治的旗帜下重构社会价值和政治体制；后者以在法定框架内争取和维护基本权益为特征。这些转变和特征都是由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统治秩序所决定的。

某种程度上，社会冲突的阶段和中国第一轮改革和第二轮改革的阶段是相契合的。如果说在第一轮改革中，知识精英引发的社会冲突可能带有政治目的，那么从第二轮改革起，以工农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爆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则更多属于纯粹的利益冲突，是“相对剥夺感”带来的不满，是为了维护自身一点可怜的利益的无奈之举。

利益冲突和其他冲突最大的不同是，有很大的讨价还价空间，也正因为此，利益冲突被称为最理性的冲突。这一阶段的社会冲突，只要处理好其实政治风险很小。

最大的危险

利益冲突之所以会演变成破坏性极大甚至政治冲突的原因，是因为弱势群体缺乏利益诉求渠道，导致不满不断积聚，终于爆发。这就需要一个正常的利益表达与解决机制。

3月26日开庭审理的广西法官黎朝阳死于看守所案，之所以能翻案，是因为死刑犯黄子新在行刑前，突然提出检举立功的请求，交代黎朝阳死亡的真实经过。而李养明之死能被拨乱反正，源自“躲猫猫”

的荒诞不经。这类案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太具偶然性。在强势的权力机关面前，弱势群体的利益难以得到有力的保障。

4月1日，解决执法过程中当事人的非正常死亡，在全国公安机关相关会议上被列为公安部今年反腐倡廉的重点。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化的东西，能够从制度上避免这类案件的发生，给弱势群体正当的利益诉求渠道。

由于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可能完全“消除”冲突和矛盾。但是，面对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冲突和矛盾，必须有一套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来解决——公平解决。

众所周知，目前真正束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是政治体制。市场和政府本来是相对应的，而在中国，市场的建立最初由政府强力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权力机关被诱发出了逐利的本能，最终导致市场的权力化和权力的市场化。很大程度上，公共权力成为谋利的手段。权力资本化使市场经济畸变为“依附权力的经济”。正因如此，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反垄断法并没有反行政垄断。

许可证制度、审批制度、准入制度、政府定价、特许经营等，正是公

权和市场捆绑的结果。在这样的畸形市场经济下，利益均衡不可能通过正常博弈达到。单纯的经济高增长无法带来安全感、人心稳定和社会稳定，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则往往是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的根源。公权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平。

对于大部分社会冲突，如果政策适当，会大大减少以至消灭危机因素；如果处理不好，则可能会引爆大的危机。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美国面临的危机最严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和突出。在冲突一触即发之际，罗斯福新政的推出使社会归于稳定。这是政府的作用。而目前中国很多社会矛盾的激化都和权力机关息息相关。公权私用、执法机关滥用暴力、个别地方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政府部门不作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

中国社会今日的诸多社会冲突，必须通过政治体制及时转型而得到解决和控制。国家如何实现其超越性与公正性，是人们的目光越过对一时稳定的维护与追求之后，亟待解决的课题。

（摘自《南风窗》）

今日说法

最近我常常在反思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人大代表，是否真能代表

人民？

——广州市人大代表梁凤莲。她直言自己所提出的不少议案、建议，最后都被相关部门搪塞了事，无奈之余，深感愧对代表一职。

财政如何透明？

——一名政协委员的疑问

□季天琴

财政必须增加透明度，只有透明之后，我们才能具体地说，哪笔安排不妥当。现在不是这样，都是等公众偶然捡到一个发票上网曝光，或在网上发现官员公款按摩，才开始事后追责。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搞财政学研究的蒋洪最近走进公共视野，是因为和财政透明较上了真。

他组织了上海财经大学 10 位老师和 100 多名学生，通过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财政厅（局）进行财政信息调查，给各省市自治区的财政透明度排排坐，按分数高低排序是：福建、内蒙古、安徽、北京、辽宁、江苏、天津。

在蒋洪他们精心设计的问卷中，共有 113 个问题。他们希望 31 个省市自治区提供 2006 年度政府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国有企业基金 3 个部分共计 113 项财政信息。

与枯燥的数据和排名相比，整个调查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小事故。

2008 年 10 月，项目组发动学生通过网络和公开资料搜索各个省级单位信息公开办公室的联系方式，有 6 个省没有公布。按照 2008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些联系方式首先应

该公开。

根据已有的那些联系方式，调查组成员打电话确认地址。公布联系方式的那些省级单位有 1 个空号，3 个省电话无人接听。

在确认了各省级信息公开办的联系方式后，项目组成员向这些机构发出申请书和问卷，表明来意，并未提到蒋洪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也并未提示要排名。

换句话说，项目组成员只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申请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规定了公民申请信息的权利，同时也规定，各级政府信息公开机构有提供信息的责任和义务。

申请书以 E-mail 和挂号信的两种形式寄出。考虑到信件遗失或接收人员的疏忽等偶然因素，项目组一度采取轮番作战的形式，让 5 名成员分别给各省信息公开办公室寄了挂号信。结果，项目组收到了很多抱怨电话——怎么都是一样的内容，不是增加我们工作量吗？

更多的回应则是，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无法得到财政信息，建议向财政厅申请。2008年11月，课题组又以上海财经大学名义发出31封挂号邮件至各省财政厅。这一次，仍然有12个省没有任何回应。

在19个有回音的省财政厅中，仅福建、内蒙古、安徽、辽宁等几个排名靠前的省份提供了有价值的财政信息。不少省份的财政厅又向项目组建议——去找对口的单位要财政信息，比如说，如果你们需要教育方面的财政信息，可以去找教育厅呀。

蒋洪他们一听，坏了。一个个找下去，必将是个无底洞，所以挂号信也就止于财政厅了。

为了各省的数据不留白，项目组组织了近百名本科生在网上“人肉搜索”，从各类年鉴和网页中收集信息。学生们搜集了一个月的信息，拾遗补缺的功效不是很大。因为各类数据散落各处，而且公布出来的本来就很少。所以，“凡是排名靠前的基本上都是主动提供数据的”。

2009年1月8日，项目组又发出了第三次函件。这次，他们把整理出来的数据分别寄给各省财政厅，希望他们对此有所补充。希望又一次破灭了，有5个省份对项目组发出的三次信函从头到尾均置之不理。

各省的心态也值得玩味。蒋洪

透露说，有几个关键的省份还组成了“攻守联盟”，在透露信息的口径上保持统一——哪些数字大家一起给，哪些不给。

蒋洪说，这项研究之所以选择财政透明度作为考察政府信息公开的切入点，一来是为了考察当家的把钱管得怎么样，二来是因为财政透明度在技术层面相对简易可行，不管是在2006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之前，还是在收支分类改革之后，政府财政信息的登记都是十分规范的，因此，“信息公开几乎不存在什么技术上的困难，关键是政府愿不愿意公开”。

令调查组感到最不满意的是，凡是涉及细节的财政信息，基本无法获得。诸如“津贴补贴和奖金项目明细支出内容”、“差旅费项目的明细支出内容”、“本级财政累积债务按期限结构分类的政府债务金额”、“本级政府直属各国有企业集团(总公司)年度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等，所有省份均无法获得和未能提供。

在搜寻的113项财政信息中，即使是提供最全面的福建省，仍然有40项信息无法获得。

“只有了解到政府最基层单位的所有收支情况，才算得上是了解政府的财政信息情况，才能够真正知道政府的钱是怎么花的，花到哪里去了。”蒋洪说。

为了便于比较，项目组还选择了中国的香港、澳门和美国的纽约，

日本的奈良县、大阪府，这些大致相当于我国省级部门的城市，用同样的113个问题对他们的财政透明度进行评估。结果，所有财政信息，只要是政府确实发生和存在的，在这些城市都可以很方便地获得。

蒋洪以日本大阪为例，说明对方的财政信息细致到难以想象——具体单位的领导人给别人赠礼品，赠给谁，赠了什么，哪天赠的，在哪里赠的，这些都会一一列出来。

作为财政专家，在参与政协小组的财政预算报告会议时，蒋洪总是被同组内一干看不懂预算的委员委以重任，但是他最后也只能沮丧地承认——材料没办法让人理解。

“太笼统了，你无法对那些数字做出评价，但是对公款的滥用实际上都在细节中。”蒋洪举例说，或许一个单位列出了对外交流支出，但到底去哪里、去干什么、停留在哪里、食宿等费用都没有列出。

“现在是代表委员们到了开会的时候才能拿到预算。按理说，财政预算应该在人大开会之前提前公布，告诉老百姓怎么花钱，老百姓才能有反映，代表和委员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财政信息公开方面，香港是蒋洪口中绝对的正面典型。今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宣读新年度财政预算案，7大本16开黄色封面的预算案加起来近20斤，开支甚至详细到座椅。为让市民能充分了解财政预算案，特区

政府出尽各种招数：派传单、建网站、上电视、接热线。在港府财政预算案网页(www.budget.gov.hk)上，预算案一字不落全数上网，甚至预算案漫画版都一应俱全。

蒋洪还曾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向各省人大财经委提出了申请，原以为他们会欢迎这项调查，因为他觉得我们是在帮人大履行职能。人大履行预算审查的职能，基本条件就是要获得信息。但获得的反馈是，人大财经委和预算工委所获得的信息情况不比一个认真的公民获得的更多。对此蒋洪表示难以相信，因为他发函的对象是人大财经委和下面的预算工作委员会，这些人是专门审查预算的。每年的预算是怎么通过的？是由人大财经委审核了以后，出具一个意见书，然后把这个意见书放在全体委员会上表决。换句话说，人大财经委提出的意见书是决定性的。

整个人大，这个机构最应该懂得预算的。这些专业人士不懂的话，其余的就更别提了，那人大的审查监督功能就完全虚设了。

蒋洪说，现在政府有三个口袋——社会保障基金、经营性的国有企业基金、政府基金，有两个口袋基本不让看，还有一个口袋只看一半。即使报告出来的那部分，也被笼统化了。比如说，基建花了多少钱，你对这个抽象的数字根本无法评论，基本建设必须列到项目的层次。现在，代表和委员对预算基本

削减公车比限行更能缓解拥堵

相信大家都记得 2006 年的中非峰会，除了个别路段外，峰会期间并没有限行措施，但整个北京却少有的一路畅通，秩序井然。究其原因，就是中央驻京机关公务车的 50%、北京市属机关公务车的 80% 被封存。峰会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49 万辆公车入库封存，本市各机关事业单位没有因此而受到“丝毫”影响。在其他既定不变的情况下，封存部分公务车，竟能极大地改善交通状况，这个措施实在是值得坚持。

当然也有人质疑，比起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在北京的政府及事业单位公务车数量并不占优势，而且比例还可能逐年下降，削减政府公务车如何能够真正缓解交通呢？其实，只需简单算上几笔账，即可一目了然。

中非峰会时北京全部的机动车保有量大约为 280 万辆，而仅仅封

存其中 49 万辆公车，交通状况就能极大改善，至少说明了公务车是导致拥堵的重要力量。原因很简单，公务车油是公家的、车的损耗是公家的，就连司机也是公家的，用起来不心疼，自然上路率高。有数字可以佐证，养一辆公务车平均每年差不多要 6 至 10 万元甚至更多，而养一辆私家车平均每年不过 2 万元左右。在这个意义上，一辆公务车差不多相当于 3 辆私家车。

而且，公务车的绝对数量也不低。北京公务车具体数量不详，根据 2006 年中央驻京机关公务车的 50%、北京市属机关公务车的 80% 被封存就能达到 49 万辆来估算，那时北京的公务车总量当在 80 万辆左右。而当时北京机动车总共才有 280 万辆，这个数字在 2007 年底是 312.8 万。其中，公务车肯定在 80 万辆的基础上又有增加。再加上外地来京办事的公务车，可谓惊人。

（摘自《京华时报》）

无话可说。

财政必须增加透明度，只有透明之后，我们才能具体地说，哪笔安排不妥当。现在不是这样，都是等

公众偶然捡到一个发票上网曝光，或在网上发现官员公款按摩，才开始事后追责。

（摘自《新民周刊》）